

XUESHU LUNWEN XIEZUO SHI JIANG

学术论文 写作十讲

徐有富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XUESHU LUNWEN XIEZUO SHI JIANG

学术论文 写作十讲

徐有富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论文写作十讲/徐有富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 - 7 - 301 - 30827 - 1

I. ①学… II. ①徐… III. ①论文—写作 IV. ①H1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19418 号

- 书 名** 学术论文写作十讲
XUESHU LUNWEN XIEZUO SHI JIANG
- 著作责任者** 徐有富 著
- 责任编辑** 徐 迈 延城城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30827 - 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 - 62752015 发行部 010 - 62750672 编辑部 010 - 62752022
- 印 刷 者**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373 千字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7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开头的話

我們已經學習了許多課程，掌握瞭許多知識。本書的目的是講授獲取知識的本領，告訴大家如何去讀書治學。梁啟超1923年1月13日作《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①和程千帆1996年10月9日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所作的講演，都講瞭這樣一個故事，呂洞賓遊戲人間，在一個人傢里住了很久，臨走時，他問主人：“你有什麼需要的東西我可以幫助你。”那主人沒有回答他，呂洞賓就把手一指，一塊石頭變成了金子。再問要不要，他不要。呂洞賓就把一塊更大的石頭點化成金子，諸如此類，主人都說不要。呂洞賓就問他到底要什麼，那個人想了半天，說：“我要你點石成金的指頭，我要瞭這塊金子就只有這塊金子，而有了這個指頭，我就什麼都可以點。”程千帆指出：“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發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個別的知识，而是要得到那個研究學問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②

唐代詩人高駢寫過一首題為《閩河中王鐸加都統》的詩：“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③詩的作者聽說別人升瞭官，很嫉妒，在發牢騷。如果我們把讀書治學比作詩中的煉丹修行，沒有掌握正確的方法，花四十年的時間也未將金丹煉出來，而掌握了正

① 梁啟超：《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見《飲冰室文集》之四十，《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36年，第8頁。

② 程千帆：《兩點論——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漫談》，見《程千帆全集》第1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6—177頁。“點石成金”故事見[清]方飛鴻《廣談助》卷三〇《諧謔》，亦見王利器輯錄《歷代笑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12頁。

③ [唐]高駢：《閩河中王鐸加都統》，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五九八，中華書局，1960年，第6924頁。

确的方法,选择了正确的目标,就会事半功倍。

学术论文是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王充《论衡·超奇》篇谈道:“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①因为学术论著体现了一个人的创造性,优秀的学术论著可以推动历史的前进,加快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的现代化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为主要撰稿人的论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所以,那些在著书立说方面卓有成就的人受到社会的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②可见著书立说,凡有益于社会进步者,往往具有很长的生命力。

写论文也是学习知识的好方法。胡适尝云:“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③因为,为了写论文而去读书,就会学得积极主动,深入细致,针对性强,而且会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同为学习而学习,为读书而读书比起来,效果当然要好得多。

读书治学也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享受。欧阳修在《读书》诗中深有体会地说:“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④苏轼也说过:“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⑤他们说的可能侧重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写作,学术论著的阅读与写作也一样。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文科,到了年龄,也可能退休,但是他们在退休以后,仍然照样研究,照样写作,生活内容非常充实。

① 黄晖:《论衡校释》卷一三,中华书局,2006年,第607页。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五,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4297页。

③ 胡适:《读书》,见《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④ [宋]欧阳修:《读书》,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九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3660页。

⑤ [宋]何道:《东坡事实》,见《春渚纪闻》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商务印书馆,194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 7713—1987)指出：“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照学界的一般理解，读书治学的水平主要是通过学术论文、论著来体现的，你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就说明你已经比较好地掌握了治学方法。所以本书将重点探讨怎样写学术论文。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科研能力，并使读者了解与掌握学术论文写作规范。

目 录

- 开头的话/1

- 第一讲 怎样选题/1
 - 一 选题的原则/1
 - 二 选题的方法/41
- 第二讲 怎样查资料/55
 - 一 查资料的意义/55
 - 二 查资料应从目录索引入手/62
 - 三 查资料的一般程序/73
 - 四 查资料的其他方法/79
- 第三讲 怎样作社会调查/98
 - 一 社会调查的意义/98
 - 二 社会调查的方法/106
 - 三 怎样搞好社会调查/114
- 第四讲 怎样读书/123
 - 一 泛读/123
 - 二 精读/136
 - 三 读书要思考/142
 - 四 读书要有目的/153
- 第五讲 怎样写读书笔记/158
 - 一 写读书笔记的意义/158
 - 二 写读书笔记的方法/161
 - 三 读书笔记的载体/167
 - 四 写读书笔记的注意事项/174

目 录

第六讲 怎样判断资料的价值/181

- 一 看是否原始/181
- 二 看是否完备/191
- 三 看是否可靠/196
- 四 看是否有影响/207

第七讲 怎样鉴别资料的真伪/217

- 一 资料真伪的含义/217
- 二 鉴别资料真伪的意义/219
- 三 资料辨伪的方法/222

第八讲 治学方法举要/235

- 一 考证/235
- 二 归纳法/254
- 三 综合研究法/261
- 四 比较研究法/283

第九讲 论文写作方法/294

- 一 关于标题/294
- 二 关于论点/295
- 三 关于论据/301
- 四 关于论证/316
- 五 关于引文注释/323
- 六 关于投稿/329

第十讲 治学态度/335

- 一 要有恒心/335
- 二 要认真/341
- 三 要有学术道德/345
- 四 要谦虚/350

参考书目举要/362

后 记/367

修订本后记/369

第一讲 怎样选题

经验告诉我们,治学的首要问题是选题。有一个好的选题,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会目标明确,进展顺利,容易出成果,而且很快能产生社会效益;反之则会困难重重,难以出成果,甚至会出现半途而废的现象。那么一个好的选题应当具备哪些因素呢?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的论文选题呢?

一 选题的原则

对选题的原则可能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选题要有用,要新,要力所能及,现分别述之如下:

1. 选题要有用

我们写文章总希望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我们写课程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总希望获得好成绩,以表明自己的学术水平与自身价值,那我们的论文题目就应当贯彻有用的原则,或者说我们的论文选题要有意义。林庚认为:“选题有没有意义是至关重要的。选题如果没有多大意义,即使做得很用功,做出来价值也不大。假如古诗中有那么一首作品,过去不知道作者,通过考证,知道了某一首诗的作者是谁。这种考证固然增加了知识,也可以算是学问。但如果作者既很平常,作品也很一般,本来就没有人过问,文学史也不提它,那这种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任何影响也不会产生。这虽然也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孤立的,根本不和其他问题发生任何关系,好比一潭死水,没有波澜,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

选择一个题目,这个问题研究出来,最好希望它富于生命。”^①

经世致用是我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传统观点。孔子论《诗》就特别注意发挥《诗》的社会价值,《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他对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后来学者写论文也注意贯彻有用的原则,如东汉时有人嫌王充的书篇幅太多,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回答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②北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是为了经世致用,其《进书表》自称:“每患迂、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③该书的书名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南宋的真德秀还强调了文学研究也应当经世致用,他说:“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④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的观点尤为鲜明,指出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⑤他还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⑥因此有人请他写谀墓的文章,他一概拒绝。

近人黄侃认为:“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目的,因此,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他的学生殷孟伦认为:“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国计

① 《发现问题和职业敏感——林庚先生访谈录》,见《文史知识》1999年第7期。

② 黄晖:《论衡校释》卷三〇,第1202页。

③ [宋]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卷末,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④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见《文章正宗》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⑤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

⑥ [清]顾炎武:《与人书三》,见《亭林文集》卷四,《四部备要》集部,中华书局,1920—1936年。

民生的利益。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①

当然,治学是否贯彻致用的原则,主要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学术论著。陈寅恪虽然没有什么宣言,但是他的论著告诉我们,他也是主张做学问应当对社会的发展起一点作用。比如他在《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谈道:“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其末云‘号称莲花色尼’。盖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也。佛教故事中关于莲花色尼者颇多。此写本所述,即其一种。寅恪初取而读之,见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于是他查了巴利文有关经书,发现“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其中有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者,即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迨既发觉,乃羞恶而出家焉”。这个故事内容显然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冲突,所以被故意删掉了。^②他还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③

他还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对《马氏文通》死搬硬套印欧语系语法的做法作了分析批评,指出:“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但是“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

^① 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精神》,见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40—41页。

^② 陈寅恪:《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见《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9—175页。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284页。

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选题要有用的原则简单地理解成为政治服务,“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做法,恰恰是应当摒除的。也不能像汉代今文学家那样直接将古书应用于现实。梁启超指出:“两汉之间,儒者通经,皆以经世,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盖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②孙钦善进一步分析道:

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即强调经书的直接的、简单化的实用目的。如前汉今文家以《尚书·禹贡》治河(见《汉书·平当传》),以《尚书·洪范》察变(见《汉书·夏侯胜传》),以《春秋》治狱(《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以《诗经》当谏书(见《汉书·儒林传·王式传》),或当规戒(如《韩诗外传》)等;此外,今文学多言阴阳灾异,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把儒学神化,为巩固现实统治服务。^③

在我们看来“有用”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凡有益于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选题,即使是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编一部工具书,应当说都符合有用的原则。胡适曾举例道: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子民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④

清人王梦阮和沈瓶庵写过一本《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历经波折,后为顺治皇帝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封贵妃。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鲁迅指出:“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

①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252页。

②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见《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129页。

③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63页。

④ 胡适:《庐山游记》,见《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董小宛做妃的道理。”^①清人徐柳泉尝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②鲁迅指出:“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③蔡子民《石头记索隐》称:“《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④鲁迅指出:“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⑤

王梦阮、徐柳泉、蔡子民是《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把《红楼梦》与清朝政治作简单的比附,而不要任何的证据。胡适撰《红楼梦考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他们唯心的研究方法。顾颉刚曾经谈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有两点成就:“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观点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上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橛。”^⑥胡适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成绩是运用了考证的方法,一切凭材料说话。胡适所倡导的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陈垣编纂《中西回史日历》,花了四年时间,修改了五次,他在《自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岂敢言历哉!”^⑦应当说编纂这样的工具书,其选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9—350页。

② [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五,见上海文明书局辑《清代笔记丛刊》,上海文明书局民国石印本。

③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349页。

④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350页。

⑥ 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⑦ 陈垣:《自序》,见《中西回史日历》卷首,中华书局,1962年。

我们的选题有用,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产生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就说过:“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①近现代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等都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学术论著也是与推动中国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当然这种参与,也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例如北方许多城市严重缺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史念海专门研究了西安缺水问题。认为唐代长安城内可以行船,现在西安严重缺水与终南山的森林受到破坏有关。如今之计,应培育终南山的森林,增加河流流量。史念海教授谈道:

1992年,我将这个设想和建议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经陕西省林业厅和西安市林业局邀集西安林业专家审议,认为这是“根本解决用水困难问题的重要措施,建设这项工程意义深远”,并责成西安市林业局成立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秦岭北坡,即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四县山区部分水源涵养林的建设工程。后来听说,中央林业部过问此事,并规定林业部拨款两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建设经费。^②

20世纪80年代初,有感于借书难,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一贯主张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并且有许多为读者服务的感人事迹,于是我就写了篇《对读者应具摩顶放踵精神》^③的文章。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出来,因为李小缘所提倡的这种精神,正是广大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正如严耕望所说:“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甚至对于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希望有较大影响力,那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④

当然也有不同观点,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曾反对过学以致用。但是他们的观点往往前后矛盾,难以为据。如章太炎

① 鲁迅:《趋时和复古》,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

②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初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③ 徐有富:《对读者应具摩顶放踵精神》,见《大学图书馆通讯》1984年第1期。

④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2页。

1906年《与王鹤鸣书》云：“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①后来在《与钟君论学书》中又说：“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②这两句话的意思都不那么周密，“不暇计”并不等于不计；“用在亲民”也还是用，而且是更重要的用。当他在谈到学以致用的时候，措辞倒是非常明确的，如他对顾炎武就非常推崇，曾于1908年《答梦庵》云：“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③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说求学》的演讲中谈道：“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国之圣贤孔子、王阳明等是。顾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学理，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然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④这段话强调学以致用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认为求是与应用二者不可得兼的观点却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求是是为了更好地应用，而应用也应当求是。

胡适1919年8月16日《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云：“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个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⑤首先，胡适是在强调整理国故的重要性时说这番话的，未免过于夸张。其次，如前所说，他在从事《红楼梦》考证时，特别强调了它在治学方法方面的示范作用。后来，他在1928年9月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又改口说：“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妄费精力的废物。这三百年的考证学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价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绝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

①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见《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② 章太炎：《与钱君论学书》，见《文史》第2辑，中华书局，1963年。

③ 章太炎：《答梦庵》，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398页。

④ 章太炎：《说求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20页。

⑤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见《胡适文集》第2册，第327—328页。

费心思。”^①

章太炎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说过：“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②顾颉刚毕竟离开不了人生的约束，他于1936年正式成立的禹贡学会终于高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该学会之《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有云：“士居今日，欲求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其道固有多端，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实属重要之一，盖研究吾国地理之目的，端在明了古今疆域的演变、户口之增损、民族之融合、山川之险易，以及郡县建置、道路修筑、边城关堡之创设，运河沟洫之浚凿、土地物产之利用，其所关于民生经济及国家之大计者为至重且巨也。”^③我们再看看顾颉刚在古史辨、民俗学、历史地理、《尚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又有哪一项是无用的研究呢？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下梁启超的观点，梁氏认为：“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④复称：“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⑤并强调指出：“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也。”^⑥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纯粹的为学问而治学问的人是没有的，即以梁启超用作例证的乾嘉学者而言，他们做学问同现实保持较远的距

①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集》第4册，第112页。

② 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卷首。

③ 史念海：《顾颉刚创立禹贡学会及其以后的二三事》，见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70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饮冰室合集》，第36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三，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饮冰室合集》，第78页。

⑥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饮冰室合集》，第99页。

离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正如柳诒徵所说：“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力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①清代一些汉族官员埋头校经考史，其实也是一种姿态，表明自己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而这正好也表明了他们对文字狱顾虑重重。其实梁启超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指出：“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②借做学问来作自我保护，这也是致用的表现形式之一。

当时不少学者还把治学教书，修志纂谱当作终老送穷的一种手段。梁启超即指出：“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也。”^③顾千里帮人校书，章学诚帮人修志就是典型例子。只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厌于仕宦，有人却没有条件当官，只好替人帮忙或帮闲。

乾嘉学者校讎古籍，为后人提供了许多较为正确的文本或校勘资料，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云：“以予之识暗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稍自慰矣夫。”^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亦称：“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迄《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輿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儻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著之铅槧，贤于博弈云尔。且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齟齬前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三编“近代文化史”第八章“康乾诸帝之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31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饮冰室合集》，第22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八，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饮冰室合集》，第47页。

④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